

王晓纯 吴晚云 主编

N

e

w

H

u

m

a

n

i

t

i

c

s

S

e

t

i

c

s

no.08
新人文
丛书

全球对话主义

21世纪的文化政治学

金惠敏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Global Dialogism

A Cultural Politics for the 21st Century

全球对话主义

21世纪的文化政治学

金惠敏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对话主义：21世纪的文化政治学/金惠敏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2
(新人文丛书)

ISBN 978-7-5133-1093-2

I. ①全… II. ①金… III. ①全球性—研究 IV. ①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07348号

全球对话主义：21世纪的文化政治学

金惠敏 著

策划统筹：陈 卓

责任编辑：陈 卓

封面设计：@broussaille私制

版式设计：刘洁琼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660mm×970mm 1/16

印 张：10

字 数：125千字

版 次：2013年2月第一版 2013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093-2

定 价：2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新人文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晓纯	吴晚云
副主编	罗学科	史仲文（执行）
	张加才	郭 涛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建嵘	马立诚	王向远	王清淮	王鲁湘
刘丽华	安乐哲	尤西林	吴 思	吴祚来
张 柠	汪民安	李雪涛	陈晓明	邵 建
赵 强	单 纯	金惠敏	骆 爽	夏可君
黑 马	熊培云	敬文东	谢 泳	戴隆斌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革	王鸿博	王景中	王德岩	曲 辉
刘永祥	孙德辉	李志强	邹建成	张卫平
张 轶	张常年	周 洪	屈铁军	赵玉琦
赵晓辉	赵姝明	袁本文	铁 军	秦志勇

【总序】

新人文：在思想与行动之间

王晓纯

“人文”一词，用法不一。古人将之与“天文”对举，今人把它与“科学”并列，它还常用来概称一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的崇扬人性与人道的主义或精神。

“人文”与“天文”对举，最早出现于《周易》。《周易·贲卦》彖辞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根据后人的解释，“文者，象也”，即呈露的形象、现象。于人而言，包括人世间的事态、状况，并可以引申到个人气象与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强调“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总是与人文密不可分。人而文之，方谓之文明。在中国传统中，“人文”主要指人类社会的礼乐教化、典章制度和道德观念。而文明在其本质上，乃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自觉和这种自觉在实践中的表现。

“人文”与“科学”并列，与西方近代分科之学的出现与发展有关。伴随科学与技术的勃兴和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通过科学与工业革命不断推波助澜，甚至形成了科学与人

文之间所谓“两种文化”的分裂。

“人文”作为一种精神或主义，泛指从古到今东西方都出现过的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人的旨趣和理想的一般主张。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新人文是一种新愿景。现代社会使人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面前常感无力，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幸福之间往往容易失衡。新人文将目光聚焦于人本身，重塑价值理性，高扬人性尊严，唤起内心力量，促进个性自由发展，让梦想不再贫乏，让精神充满希望。

新人文是一种方法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两者的分隔也有渐行渐远之势。新人文试图重新发现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融通，增进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互用，让科学更加昌明，让人文之光更加夺目。

新人文是一种行动哲学。继往圣、开来学不是思想者的唯一目标，理想与现实之间需要架设坚实的桥梁。新人文力图夯实人文基础，作为社会的良知而发出公正的呼声，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让思想冲破桎梏，用行动构筑未来。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编辑了这套“新人文”丛书，奉献给关心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新人文建设的广大读者。

2012.10.19

序言

就国际范围而言，当然也包括中国，全球化作为一个学术的和社会的话题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启动起来的。之后，迅即升温，接着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大面积的高热、高热、高热……是否会降温，不好贸然断定，但如今的情况则确乎是欲说还休而不说也罢了，因为好像已无话可说。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列出无数的原因，比如说任何一个学术话题都是有其生命周期的，比如说缺乏一些强有力的社会运动或事件的推动，在中国就是“申奥”和“入世”，再比如说言说的亢奋终归会过渡到操作的实际层面。但有一个重要而被忽视的原因是，全球化研究一直就缺乏哲学的介入，换言之，哲学家一直就超然于全球化这个世俗的话题。全球化深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部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但唯独哲学和哲学家除外。没有哲学的介入，任何话题的讨论都将流于表面、肤浅，也将很快使人厌倦。厌倦是必然的，持续的注意对人的智力是一种折磨，但哲学肯定可以延缓厌倦的过早出现，如果不能永久阻止的话。这一方面是全球化研究的缺憾，但另一方面也未始不是哲学的悲哀。

全球化已经向传统哲学观念提出了许多挑战，已经潜在地更改了原有

的哲学程序，哲学已经“死机”了——这似乎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而只有哲学家浑然不觉，他们仍一如既往地沉浸在对头顶星空的冥想或者对内心道德的省视之中。

在对全球化的各种表述进行调研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觉到，全球化研究渴望哲学的支援，而哲学也应该回应全球化而丰富自身。这将是双赢的事情，奚不为？何乐而不为？于是，沿此思路而前行，笔者不揣浅陋，在全球化和（西方）哲学之间往来穿梭，做双向的观察与研究。如果说这劳作还有些许收获的话，那么其中最丰硕者当属“全球对话主义”理论的提出。

关于“全球对话主义”，书中已有专论，或者也可以说，它是贯穿全书的主旋律，笔者不想也无力复述。这里仅简要指出，“全球”或“全球性”是对话的一个方面，具有共同性、普遍性、话语性的意义趋向，而“对话”的另一方面则是参与对话者的不可通约性或他者性。这就是说，“对话”本身即蕴含着一种悖论，然此悖论却也正是其生命之所在，其活力之所在。对话借其悖论而永无终期。

“全球对话主义”提出的直接机缘是德国社会理论家雷纳·温特教授的约稿。2008年我在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访学期间，温特教授邀我为他主编的《文化研究的未来》文集贡献一篇文稿。由于先期准备较充分，所以写起来很顺手，不久就完成了。一稿是中文，接着是英文翻译，最后是由英文翻译为德文。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访谈（分两次发完，分别见2009年12月3日第10版、2009年12月10日第10版），其中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全球对话主义：中国文化研究的哲学”，简要介绍了此文的主要观点。^①如今，德文版借着《文化研究的未来》而发表^②，中文版见于国

① 张清民：《文化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金惠敏研究员访谈录》（上），《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3日第10版；张清民：《文化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金惠敏研究员访谈录》（下），《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10日第10版。

② Huimin Jin, 'Für einen globalen Dialogismus: Zur begrifflichen Überwindung des «kulturellen Imperialismus» und der damit verbundenen kritischen Positionen', in: Rainer Winter (Hg.), *Die Zukunft der Cultural Studies Theorie,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im 21. Jahrhundert*,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1, S. 197–218.

内《文学评论》^①，英文版最近也接获国际主流期刊《空间与文化》主编尤思特·冯·鲁恩（Joost von Loon）教授的用稿通知。很高兴，2009年夏我在北戴河一个国际会议^②上宣读这篇论文后，得到芬兰华裔学者黄保罗先生的欣赏，他用“全球对话主义”来阐发他的“大国学”概念，后来还正式发表过一篇长文。

“全球对话主义”的提出有很长的学术和思想的发酵过程。这次整理书稿时发现，其主要思想早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就有萌芽了^③。而这是在写作《走向全球对话主义》时已经完全忘掉的事情；当时基本上是延续着拙著《媒介的后果》（2005年）第三章来做的（该章由于篇幅较长，故先后在《文学评论》、《哲学研究》、《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分三次刊出^④），所以会见到个别观点和材料的重复。该章将“全球化”作为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后的第三个社会理论或者哲学的概念；而如果将“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单向的过程，“后现代性”作为其“反过程”，那么这一正一反或其运动，也就是“全球化”的基本含义了，在此意义上，“全球对话主义”可视为对“全球化”哲学的进一步展开和表述。在最新撰写并收入本书的《别了，中国后殖民主义》一文，笔者从“全球对话主义”出发，提出对“中国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两种思想的对立是抛弃抑或固守中西二元对立模式。笔者主张，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应当为“全球意识形态”、“全球知识”作出贡献，而不是仅仅以守持“中国特色”为满足。强调特色，实际上就是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自我边缘化，是封建时代的小女子作态，大丈夫不为也。绝非危言耸听：“中国后殖民主义”一日不予清算，中国便一日无缘于全球性大国！成为全球性大国需要“全球对话主义”。

① 金惠敏：《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② “东西方相遇中的文学与文化全球化论坛”，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系主办，2009年8月27日到29日，北戴河。会议报道中提到我关于“全球对话主义”（笔误为“全球化对话主义”）的发言（许传华：《东西方相遇中的文学与文化：2009年首都师范大学第四届全球化论坛综述》，《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174页）。

③ 金惠敏：《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极境》，《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④ 金惠敏：《作为哲学的全球化与“世界文学”问题》，《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金惠敏：《区域化与世界文学的终结》，《哲学研究》2007年第10期；金惠敏：《从“文化帝国主义”到“全球化”——评汤姆林森的后现代性全球化理论》，《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本书对汤姆林森的观点多有涉及和批评，这就是为什么要附录我对他的访谈的原因。虽然我不同意他的论证，有些方面甚至是坚决不同意，但对于他以“全球化”概念取代“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则是极为赞赏的：在他看来，“文化帝国主义”代表着一种陈旧的思维方式；用我们的话说，是单一的现代性思维方式，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模式。全球化时代要有全球化思维。

本书将媒介技术视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由此说来，“地球村”实则一媒介概念，再具体一点说，实则一电子媒介概念，因为人的身体是无法比特化的。而若是反过来说，那么附录2005年穆尔教授在北京的讲演及讨论虽然涉及的是赛博空间的体验，但它也是电子时代人们唯一能够获得的“地球村”体验。我们知道，借助身体的旅行，无论如何快捷，都不会产生例如东方人与西方人或北方人与南方人同处一村的感觉。身体不能被“传播”，它拒斥“编码”。

收入本书的所有论文都已在国内外不同的期刊上发表过或已为刊物所接受，在此我要感谢那些匿名评审我论文的同行人和主编们。感谢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罗伯·希尔兹（Rob Shields）教授对英文版《走向全球对话主义》的修改和修改建议，他要我讲清楚我的对话主义与巴赫金的有何不同。后经研究发现，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以及托多罗夫和克里斯蒂瓦的相关阐释均侧重于话语一维，对话在他们主要发生在话语层面，而我的对话主义，如前所述，还有本体一维。当然，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对话”是本体性的，他将对话本体化，将语言本体化，但这样做的代价是话语与实在之间张力的丧失，话语之批判力量的丧失；或许更为不堪，是“对话”本身的删除，因为没有相对独立的“话语”，便不会有面“对”（dia-）：“对”是“二”的意思，是劈开浑沌的“区分”，是“话语”之效果；也不会有“话”（-logue）：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指明了言“说”即“话”的本质乃是其与真实的疏离。没有话语的对话将不是对话。对话虽以差异为根基，但其存在仍然有赖于话语。如前所言，对话是悖论性的。

今年有幸结识画家于会见教授，堪称平生一大快事。于先生不做理论，但他的画作却给了我很多理论的灵感，所以亦当在鸣谢之列。《别了，中国

后殖民主义》一文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写的，是理论之介入艺术，也是艺术之介入理论，是我们分别作为理论家和艺术家的对话。我之所以能够与他对话，不是因为我是懂艺术鉴赏，而是因为我在他的画中看见了理论，例如《塔》对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的揭示一如波德利亚那么透辟，可惜波德利亚是无缘寓目此杰作了。当然，《塔》不是波德利亚，否则就是对二者的贬低。二者既有交集，亦有并集。

感谢史仲文先生的约稿，这使我有机会检视自己陆陆续续的关于全球化的论述，特别是，它竟使我意外地发现我对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差不多已然形成了一个体系。是的，经历过后现代思想的洗礼，没有人还会喜欢什么“体系”；但要逃出自己的“体系”，其内在里就是思维定势，也很难。所以，见到这个体系，心情实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建造一个体系，就是建造一个囚牢。理论家的功德圆满就是作茧自缚。但愿这个牢、这个茧，能让后来者警觉而寻思着另启蓝图。

纽约福坦莫大学的兰斯·斯特拉特（Lance Strate）教授修改了英文版的《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英文版的改动在本书中以两个英文长注体现；陕西师范大学陈海同学通读全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李昕揆同学读过部分篇章。他们对完善书稿都作出了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西安雁塔

2012.09.23

目录

序言	001
走向全球对话主义	
——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	001
全球化就是对话	
——从当代哲学家伽达默尔谈开去	022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全球化	
——哲学化“全球化”与“世界文学”的终结	027
全球知识的再界定	
——费瑟斯通和他的新百科全书计划	063
作为“文化”的全球化	
——如何理解全球化的文化构成	073
别了，中国后殖民主义	
——于会见艺术的后现代崇高及其世界主义意味	083
界定“后现代主义”	
——从哈桑到杰姆逊	092
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极境	
——一个哲学性的思考	097
学术国际化，不只是一个英语问题	
——《差异》丛刊第六辑编后	101

附录一

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全球化

——约翰·汤姆林森教授访谈录.....104

赛博空间：后地理与后历史的新体验

——约西·德·穆尔教授北京讲演及对话.....124

附录二

金惠敏著译要目（1980—2012）.....137

走向全球对话主义

——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

阅读提示：文化研究已经从它的国内阶段发展到现在的国际阶段，因而也相应地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换言之，国际文化研究应该有国际文化研究的理论纲领。本文以“文化帝国主义”论争为切入点，将文化研究分作两种模式，即“现代性”文化研究与“后现代性”文化研究，分别考察了它们的长处和短处，提出了超越这两种模式的第三种模式，即“全球性”文化研究模式，其灵魂是扬弃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哲学的“全球对话主义”哲学。

一、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哲学

学界正在认识到，全球化不仅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对象，它就在我们眼前，似乎伸手可及，而且也必须成为我们考察一切现象所由以出发的一个视点。这就是说，在全球化的诸类后果之中，还有一个日益明晰的哲学后果：全球化将作为一个超越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对立的新的哲学概

念。它是现代性，也是后现代性，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就是这二者，以及这二者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

这一或许本应由哲学家来提炼的时代命题，现在却是由社会学家为我们暗示了出来的。在其《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之末章，吉登斯概括指出：“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是全球化。它远不止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弥漫，其他文化由此而被摧毁；全球化不是一平衡发展的过程，它在粉碎，也在整合，它开启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其中‘他者’再一次地不存在了……从其全球化之趋势看，能说现代性特别地就是西方的吗？不能。它不可能如此，因为我们在此所谈论的，是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兴形式与全球性意识。”^①吉登斯没有否认全球化的现代性方面，即将西方制度向全世界推广的帝国主义计划，但他更倾向于看到这一帝国主义计划在实施过程中的失败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各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依赖。与吉登斯不同，我们称此为全球化的“后现代性”维度，这也是他在别处所断言的，全球化将导致一个“失控的世界”^②。

关于全球化之为“后现代性”，汤姆林森的激进立场可能令每一位严肃的学者瞠目结舌。他那本轰动一时的专论《文化帝国主义》（该书初版于1991年），对于全球化之为“现代性”的观点，大有赶尽杀绝之势：“全球化有别于帝国主义之处可以说在于它是一个远不那么前后一致的或在文化上被有意引导的过程。帝国主义这个概念虽然在经济的与政治的涵义间游移不变，但它至少意指一个目标明确的计划：有意将一种社会制度从一个权力中心推向全球。而‘全球化’的意思则是说全球所有地区以一种远不那么目标明确的方式所发生的相互联结和相互依赖。它是作为经济和文化实践的结果而出现的，这些实践就其本身而言并无目的在于全球整合，但它们还是生产出这样的结果。更关键的是，全球化的效果

①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75.

②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2, p. xxxi.

将削弱所有单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一致性，包括那些经济大国，即前一时代的‘帝国主义列强’。”^① 但是，汤姆林森无法向我们稍微证明，且不论其后果如何，难道全球化是一个没有推动者的自然过程吗？若此，全球化除非与人无关。显然，汤姆林森的错误是用“后果”否定“意图”，他似乎不知道“意图”是主观的，而“后果”则是客观的。全球化既然是由人来推动的，那么其“现代性”便不容否定。看来，还是吉登斯的“失控的世界”意味深长，它既肯定有人控制，又看见其于结果上的无法控制。

借用一个日语词 (*dochakuka*)，罗伯森将全球化描述为“球域化”(glocalize/glocalization)^②，即是说，全球化是“全球”与“地域”的双向互动，“其核心动力学包含了普遍的特殊化与特殊的普遍化这一双重的过程。”^③罗伯森的全球化研究多从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入手，因而也更多地具有哲学的相关性。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既无法坚守地域性，也不能以全球性完全吞噬地域性，它们是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哲学问题，体现

① John Tomlinson,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2001, p. 175.

②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pp. 173-174. 后来他也使用其名词形式“glocalization”，并做了进一步的考辨，见Roland Robertson,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in: Mike Featherstone, Scott Lash & Roland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1995, pp. 25-44.

③ Ibid., pp. 177-178.

在任何一个具体的事例之中。^①

更明确地说，社会学视野中的全球化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完整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复杂关系的哲学图谱：现代性就是自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性哲学，后现代性则是胡塞尔意识到主体性哲学的唯我论缺陷之后所提出的“主体间性”概念，是后来为哈贝马斯由此所发展的“交往理性”。不管是否采用“后现代性”一语，凡是对现代性主体哲学的批判，都可以视为一种超越了现代性的“后现代性”意识。“后现代性”曾被一般人误认作一种虚无主义，包括吉登斯、哈贝马斯等，其实它不过是一种较为激进的胡塞尔主义，例如在德里达那里，它提醒，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等一切属人的东西是如何遮蔽了我们应该追求的真实，它们应该被“悬置”起来，以进行“现象学还原”。因而，后现代性就是一种穿越了现

① 英文版此处添加了如下内容：

Comparably with Robertson's 'glocalization', Mimi Sheller and John Urry see that 'All the world seems to be on the move' (Sheller and Urry, 2006: 207, also see Urry, 2000) and then propose a 'Mobilities Paradigm' for the traditionally 'static' social sciences they identify. This paradigm, as they present it, is 'aimed at going beyond the imagery of "terrains" as spatially fixed geographical containers for social processes, and calling into question scalar logics such as local/global as descriptors of regional extent' (209). However, it is not 'simply a claim that nation-state sovereignty has been replaced by a single system of mobile power, of "empire": a "smooth world", deterritorialized and decentred, without a centre of power, with no fixed boundaries or barriers' (209) as imagined by Hardt and Negri (2000).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this paradigm of sociology is to break a sedentarism loosely derived from the philosopher Heidegger who locates dwelling (*wohnen*) place 'as the fundamental basis of human identity and experience and as the basic units of social research human identity' (208-209); simply put, the subject, or broadly, the modernity, which is based upon 'place', is coming to its demise. In a global context of, say, 'mobilities', or the 'liquid modernity' (Bauman, 2000), or, in a 'globalization' 'on the move' as said previously, a sociologist can no longer speak only of the local, nor can s/he replace the local with the global, the dialectic of which indicates a philosophical question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reified in any specific instance.

本段参考文献如下：

1. Bauman, Zygmunt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2.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 Sheller, Mimi and John Urry (2006).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 38, pp. 207-226.
4. Urry, John (2000).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